

海外汉学的性别视域及其新维度

李颖¹

【摘要】：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研究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外汉学中的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层出不穷、成果颇丰。该研究打破了女性为受害者的传统观点，解构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观”。与此同时，其将中国古代女性置于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评论，重构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性别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海外汉学 中国古代女性 文化研究 性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2020) 10—0219-09

1840 年以前，西方列强尚未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海外汉学界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妇女，将她们置于时代背景中，考察她们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海外汉学的研究历程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变化、学科研究重点的变化，乃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于海外汉学界这一研究维度，中国学术界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从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到以露丝·伊里加蕾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学术界一直强调性别的“差异观”。传统的性别理论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处于劣势地位；而当代的性别“差异观”则将男性和女性视为构成人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体，强调性别平等与性别解放。不论是传统还是当代的性别差异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西方社会二元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本文对海外学术界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存在于西方逻辑中的两性视角为切入点，探讨近 30 年来海外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女性的研究重点，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以期对中西跨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一、海外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发展演变

13 世纪末，在西方人书写东方的第一部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称“中国妇女在各方面都相当不错”。1366 年，通过借鉴马可·波罗等人的中国游记，曼德维尔写出了散文体《曼德维尔游记》，其中也不乏对中国妇女的描写。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欧洲为主的来华访客，如 16 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手和传教士，17、18 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耶稣会士，18 世纪晚期以后的英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等，在对中国的记述中也有涉及中国妇女的部分。^{[1] (P147-186)} 1836 年，德庇时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著作《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因其资料丰富翔实，被公认为是 19 世纪西方对中国最全面的报道。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随着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活动，一系列反映中国妇女生活、习俗的著作相继在西方出版。在当时传教士的眼中，非基督教的婚姻是对女性的贬低和压制。从这一时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成果以观察、记录和翻译为主，如 1891 年萨福德 (A. C. Safford) 将刘向《列女传》译成英文，向海外社会介绍中国古代妇女的基本状况，但称不上是系统性的中国古代女性研究。

随着西蒙娜·德·波伏娃著作《第二性》的出版，20 世纪 50 年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重新思考妇女融入社会所面临的实

¹**作者简介**：李颖，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澳门 999078）
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讲师。（江西景德镇 333403）

际问题和所展现的生命状态。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掀起了以消除两性差别为基本主张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在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学术应运而生，西方学术界的女性研究由边缘走向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和海外汉学家开始探讨现代中国男女不平等现象，强调对妇女的桎梏是男性社会传统下女性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呼吁中国妇女实现真正的性别解放。

20 世纪 70 年代是海外学术界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海外学术界对“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了否定，开始不断颠覆性别、文化、种族的等级秩序，着眼于探讨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萨义德《东方学》出版后，海外学术界更是避免将中国形象塑造为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从而进入“将东方东方化”的误区。在女性研究领域，海外学术界开始将女性视为属于特定社会类别的独立个体，研究内容从批判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发展到阐述性别关系与经济、政治结构等更大权力结构之间的联系。海外学者不再只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妇女的问题，而且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妇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越来越重视性别差异和突出性别差异的社会意义，海外学术界不再单一关注女性问题，而是将男性群体纳入研究范畴，性别研究逐渐取代女性研究，这成为最主要的分析方法。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逐渐从研究女性在历史中扮演何种“角色”转为研究女性身份如何被构建和表述。^{[2] (P129)} 美国历史学家司考特 (Joan Wallach Scott) 在对美国妇女史进行研究时提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影响妇女史研究的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即强调男性特征和女性气质并非局限于男女的生理差异。^{[2] (P119)} 这一研究视角也对女性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以往传统的研究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海外学术界不再把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经历视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性别定义为社会框架的一个方面，将性别研究纳入对特定社会机构的讨论中。强调性别差异的后现代性别理论逐渐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研究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不论是研究社会史还是文学史的海外学者都对“欧洲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在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中国古代妇女的能动作用和主体意识^{[3] (P1-18)}，尤其注重研究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由妇女创造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美国汉学界对明清妇女文学的研究尤为突出。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海外学者不断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文学、医学等多领域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研究方向呈现多元化和细化趋势。

海外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妇女问题研究已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总结概述。如邓津华 (Jinhua Emma Teng) 在《批判性回顾：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建构》中概括了美国学术界中国古代妇女研究的发展历程^{[2] (P115-151)}，为读者了解美国汉学家的中国古代女性观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在《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研究有何帮助？——美国研究述评》论文中，曼素恩 (Susan Mann) 指出，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女性研究不仅有助于在古代经典的文本中找到新的切入点、重新发现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史料，还有利于在历史的语境下重新构筑中国古代的社会体系。^{[4] (P241-260)}

罗普洛 (Paul S. Ropp) 撰写的论文《帝制晚期的中国妇女：英文学界近期研究回顾》从亲属关系模式和婚姻制度的演变、作为商品的妇女、寡妇的贞节和自杀、宗教中的妇女、历史和哲学话语中的妇女、医疗和法律话语中的妇女、文学话语中的妇女、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妇女的读写能力和出版物等方面，阐述英文学界对 1500 年至 1800 年间中国妇女的研究，并指出了该领域今后的发展方向。^{[5] (P347-383)}

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的论著不断出现，国际期刊如《明史研究》(Ming Studies)、《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男女》(Nan Nu: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等也刊

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妇女研究的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选取近30年来在这一研究领域较为经典的著作以及视角较为独特的论文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中国的女性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二、中国古代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海外汉学家普遍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存在“性别战争”,西方才女们处境艰难;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共享同一文化“盛宴”。就文学文化而言,中国古代女性被敌对状况比西方女性少很多。海外学者指出,妇德是中国古代男性评判女性的普遍标准。除妇德之外,基于男性自身的利益出发,中国古代男性对女性抱有一定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的心理体现了男性的焦虑。

(一) 士大夫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女性

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的参与者与中国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士大夫对女性所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男性对女性的总体看法,并且这些关于女性的观点得以记录成文字,为后世所了解。曼素恩指出,自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起,被载入史书的妇女绝大多数都与家庭内的美德有关,以便为女性的性别角色提供具有教化意义的范例。而在其所研究的清朝正史中,几乎没有记载有才学的妇女。^{[6] (P261-262)} 人类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儒家的宗法制度对男性和女性要求各异。这种宗法制度要求在家庭关系中,男性要通过恭敬的行为和生育子嗣来光宗耀祖;女性则应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孝敬公婆。^{[6] (P11)} 但通过研究颜希源《百美新咏图传》的清刻本中,曼素恩发掘这部男性作品凸显了男性对女性的欣赏之情。^{[6] (P264-265)}

白馥兰(Francesca Bray)认为衣、食和子孙是中国古代女性对古典礼仪的三大贡献。正是这些由女性参与构建的仪礼延续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具有性别分工的男耕女织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支柱。通过研究,白馥兰发现晚明时期女性参与妇女工作的意愿减弱引起了男性精英阶层的极大焦虑。

在明朝和清初,男性精英阶层对女性刺绣抱有矛盾心理。因为刺绣是一种不服从于男性、家庭以及群体的劳动形式,而只是维系妇女之间的纽带,因此正统的新儒学对刺绣持难以认同或不鼓励的态度。白馥兰指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就认为女性应该织布,而将刺绣视为干扰女性正常工作的轻薄之举。陈宏谋认为刺绣是不充分的道德和实践教育,将其列为次要的学习。^{[7] (P207-212)} 中国学者田汝康觉察到,严苛的科举制度是男性焦虑的原因之一。他强调,对寡妇贞操崇拜、鼓励寡妇自杀,这些为因仕途受挫而感到沮丧和焦虑的儒生提供了道德上的出路。^[8]

(二) 文学创作对女性形象的刻画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指出,在很多明清之际的文学作品里,歌伎是爱情与政治使命的连接点,是情与忠的桥梁。孙康宜认为明朝文人之所以将歌伎与对明朝的忠诚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些爱国文人从歌伎身上看到了自己身处无助困境、生活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影子。^{[9] (P23-25)} 正如孙康宜所说:“明人相信,一往情深是生命意义之所在,也是生命瑕疵的救赎梁柱。这种看法便是晚明艳情的中心要旨。”

此一情观重如磐石,特殊脱俗,也是内心忠贞的反映。”“看在陈子龙及其交游眼里,晚明婣娟大可谓‘情’与‘忠’的中介:心中佳人乃艳情的激励,也是爱国的凭藉。胸中无畏,‘露才扬己’,又是晚明人士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深合时代氛围。”^{[9] (P1-2)} 孙康宜指出,陈子龙晚年的爱国词作,很多是从其早年以情为主题的词作中发展而来的。陈子龙将人类两大情感结合起来,把这两种情感中共有的感情强度和感性力量拉至极点^{[9] (P103)},其作品最终达到情忠合一的效果。

卢苇菁(Lu Weijing)也觉察到,17世纪中叶很多儒家士人通过为贞女撰著来表达自我。卢苇菁强调,虽然贞女一直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道德层面的重要内容,但“贞女的象征意义从未像这一时期那样深切地为儒家精英所利用,贞女行为也从未

得到如此热情的膜拜礼赞”^{[10] (P51)}。儒家学者常常在有关贞女殉死节的传记中加入戏剧成分以赞美殉节。卢苇菁注意到，与明朝相比，清初文人撰写贞女的作品数量剧增。对于很多清初的儒家学者来说，宣传贞女现象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履行宣传儒家思想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表达政治忠贞——17 世纪儒家士人最崇高的道德精神。

明末清初三大学之一的孙奇逢，通过赞扬贞女和为贞女撰文，抒发自己的政治气节、致敬明崇祯皇帝。王源和屈大均则通过为贞女立传来表达自己对懦夫的憎恶和对反清复明思想的推崇。孟称舜以贞女形象为原型创作戏剧以表达自己对明朝灭亡的悲痛。还有像魏象枢这样的理学家，通过鼓吹贞女形象，将自己视为道德守护人以掩饰自己为二主效忠的污点。^{[10] (P53-69)}

（三）对女性受教育的认识

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儒家体系对女性获取知识这一话题充满内在矛盾。在传统意义上，女性只应该阅读像《女四书》一类的专门针对女性的书籍。但纵观历史，一些极为博学的女性，如班昭，在儒家体系中仍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声誉。高彦颐认为该体系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到了明末清初，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日益繁荣，这些不协调更为突出。

一部分儒家士人开始支持女性获得一定的文学和文化教育。^{[11] (P57)}而曼素恩发现，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多数士族人家倾向于让女儿接受教育、注重培养女儿的良好教养。名门望族培养出才女能够加强家族地位、凸显父母博学，成为“家学”的一部分。^{[6] (P262)}为防止女孩因受到教育而带来一系列问题，士族家庭的策略是教导女孩工作为先，写作次之。^{[6] (P104)}由于当时学术机构的作用是帮助男性应对科举考试，通过官僚机构的选拔而出仕做官，女性不为这些学术机构所接纳^{[6] (P10)}，“女红”成为评判女性性格和德行的标准。

女性作家在自己的诗集序言中常常会称此为“绣余之作”。当时政治家们主张女性受教育，主要出于两点考虑：其一，女性可以帮助儿子准备应考；其二，女性需要拥有道德的自主性，以便更好地教养下一代。曼素恩进一步指出，清朝学者几乎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明朝闺秀作家和读者所创造的辉煌文化。^{[6] (P104-105)}曼素恩认为，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历史时期，只要女性从事写作，无论作品的优劣，其写作目的都会受到或褒或贬的审视。那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只要成为写作主体，就是挑战上层文化传统的根基。^{[6] (P18)}

在这个问题上，孙康宜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晚明时期，社会和文学领域存在一种男女平等的意识，即使不是真正的平等，至少也是基于才华和兴趣发展而来的两性间的互敬互重。文士和“才伎”作诗酬和、互赠诗词，在政治和道德上并肩而行，发展出真正的友谊。^{[9] (P22)}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出现众多女性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努力的结果。有的文人会为女性诗人提供写作指导；有的会为她们编辑词选集，甚至将女性作品与古代经典进行联系，试图将女性词作“纳入典律”。^{[12] (P175)}

（四）对缠足的看法

“三寸金莲”一词展现了中国古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明清时期，更是有文人士大夫写下如“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等赞颂小脚的浓词艳句。受 14 世纪 20 年代造访中国方济会的托钵修士欧多立克影响，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将中国女性缠足与男性长指甲相提并论，认为这两项习俗是中国传统两性审美的标准和高贵的标志。

李豪伟（Howard Levy）曾通过文字和图片对中国妇女的缠足现象进行了详尽的介绍。^[13]高彦颐对晚清至民国期间中国妇女的缠足现象进行过分析，认为中国妇女并非全是“受迫害者”，在缠足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参与度。^[14]劳雷尔·宝森（Laurel Bossen）和希尔·盖茨（Hill Gates）对缠足代表中国男性色情恋物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表示缠足风俗的盛行与中国古代以小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中国古代男权社会中妇女缠足可以确保女

性保持坐立的姿势，以便制作家庭所需的手工商品。作者认为，将中国妇女缠足与满足中国男性性需求联系在一起，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15]

海外学者从男性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女性形象，认为中国男性赞成和宣扬女性美德，但对女性才华持中立或否定态度。许多男性文人从女性身上看到了社会境遇中的自我形象，通过塑造女性角色或模仿女性“声音”，表达内心隐秘的心境与立场。孙康宜因此提出了“面具”美学观。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古代男性作者时常扮演复杂角色，情诗和政治诗成了他们的一种“表演”手段。通过性别置换与移情的方式，中国古代男性文人进入了“性别越界”的联想，通过笔下的女性形象，达到自我掩饰和自我表现的效果。^{[16] (P206-211)}

三、中国古代女性视角下的自我形象

近30年来，海外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从实际材料出发，挖掘中国古代女性自我发出的“声音”，探究女性在文学、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强调女性的自我选择，以打破中国古代女性为“受害者”的观点。海外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妇女不仅是古代社会的一分子，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创造者。海外学者的研究突出了中国古代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一）身为作者的中国古代女性

1985年，胡文楷编著出版《历代妇女著作考》修订本；1997年，孙康宜与魏爱莲（Ellen Widmer）合编出版《明清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9年，孙康宜与苏源熙（Haun Saussy）合编出版《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这些著作作为海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文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高彦颐指出，中国女性以作者和读者身份出现在晚明时期。^{[11] (P31)}许多才女在创作诗歌时为自己发声，如公然提及缠足问题，并引以为荣。尽管受过教育的女性会面临来自多方面的限制，但曼素恩提出在中国帝制的晚期，教育使得女性在审美上拥有了阐释的自由。例如盛清时代的女作家，既可以运用所受到的教育知识阐述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可以表达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在女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她们把自己想象为女性英雄，甚至想象成男性学者。虽然女性作家逐渐意识到女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但这并不能证明她们是在呼吁性别革命。中国文学中创造女战士形象的目的并非出于女性对男性权力的渴望，而是为激励女性读者为某些原因而献身。^{[6] (P262-263)}

在文学体裁方面，通过研究清代才女沈善宝撰写的《鸿学楼诗选初集》和其编撰的《名媛诗话》，方秀洁（Grace S. Fong）发现明清女性文人在作品中体现出强烈的自我再现倾向。除了坚持在文本中再现自我之外，沈善宝还不断突破自传与传记的文体界限，建构一种生命叙事。^{[17] (P201-234)}而宋秀文（Marina Hsiu-Wen Sung）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弹词视为由女性文人创作、供女性读者阅读的文学形式。^[18]罗普洛在研究16—19世纪早期中国女作家诗、词和弹词作品的文章中，也指出弹词是女性文人的文学体裁。相对于诗和词，帝制晚期的中国女作家更倾向于用弹词的形式表达自我、批判社会。^{[19] (P107-141)}远藤织枝研究诞生在汉朝、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江永女书时，认为女书与被剥夺学习汉字资格的女性们密切相关，体现了女性对封建礼教不允许女性读书识字的反抗，凸显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创造性。^{[20] (P20)}

（二）对空间的超越

海外汉学家注重从空间的概念上研究中国古代女性。高彦颐通过分析明清女性的诗文作品，从宦游、赏心游和谋生游等方面探究了江南市镇的名媛、女文人以及名妓的旅游活动，研究她们在旅途中的活动范围、文化生活、文学创作等内容。高彦颐认为妇女们所开拓的空间对“三从四德”等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意义。在妇女谋生游一节中，高彦颐介绍了良家女、士人妻身份的黄媛介以诗画代夫营生，实则“于内人名称之外，同时活动于‘外人’交际圈”，处于“‘既内而外’的暧昧空间”。

这些江南名媛、女文人和名妓不同于以前的古代妇女，有一定的行动空间和交际自由。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争取到了有弹性的行动空间，与丈夫之间进行了位份的倒置，虽然并不代表两性秩序的错乱，但颠覆了社会强加于她们的“三从”秩序。通过她们的实践，也使“内外分明，男女有别”的规范在实践层面变成了相对性概念，而非绝对标准。高彦颐还讲述了女性的卧游。她发现，明清才女可以通过书信、诗词及学问钻研而遨游四海，“借吟咏而超越生命加诸其身的种种限制与得失，超越一己之孤单而侧身更辽阔的时空”，这是女性通过阅读获得的人生意义。^{[21] (P21-50)}

可以看出，文学激发了女性思考的能力，而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具有超越意义，使她们能够通过写作超越礼教中所规定的“女性领域”的范围。而在著作《闺塾师》中，高彦颐认为明末清初江南的闺秀不是受压和无声的，她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将亲朋关系扩展到家居空间之外，其影响力也拓展到新的方面。钱南秀认为通过编译《外国列女传》，薛绍徽积极拓展了女性的道德空间和才艺空间，甚至试图为女性构筑理想的空间。^{[22] (P187-231)}在《儒学与女性》著作中，罗莎莉（Rosenlee LiHsiang Lisa）则着重阐述空间中的内外概念，分析女性在被限定为“内”领域中的身份与渴望在“外”领域中进行文化追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23] (P80-134)}

（三）女性独有的道德力量

中国古代妇女除了通过写作超越社会对其设置的禁锢之外，还不断行使道德力量来获得权威感。孙康宜重视女性才德与权力的内在联系，她认为传统中国男女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当复杂，不能将传统的中国男性与女性简单视为“压迫者”与“受害者”。中国传统女性的权力存在于道德的上下文之中。她认为道德力量是“道德权力”（moral power），指的是“中国传统女性在逆境中对自身高洁忠贞的肯定，从而获得的一种‘自我崇高’（self-sublimation）的超越和权力感”。这种道德力量能够使中国古代女性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磨难，从而获得一种“生”的力量。孙康宜强调，除了德行之外，一个女子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下她心灵的崇高，“那么，她便能获得一种不朽的文学和道德权威”。^{[24] (P67-76)}孙康宜列举班婕妤、苏蕙、明朝寡妇诗人“文氏”、李玉英等人的例子加以论证。曼素恩也指出，虽然从17世纪开始，知识女性越来越多，但女性的权威仍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和写作。女性在写作中所发出的“声音”，使得其在家中以及在儒家的最高境界“文”中具备道德权威。^{[6] (P147-284)}

（四）皈依宗教

除了不断地提高才能、获取道德力量外，中国古代妇女还有另一种选择，即通过皈依宗教摆脱社会的束缚。在文章《一世纪和二世纪中国尼姑庵对女性的规约》中，蔡安妮（Kathryn A. Tsai）通过研究《比丘尼传》中的传记，分析女性出家的原因。不论是寡妇受家庭逼迫要求其再婚，妻子由于丈夫品行不端想要离婚，女儿为孝敬父母愿意终身不嫁，还是六朝时期经常发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导致妇女居无定所，尼姑庵成为这些妇女的避难所，她们通过皈依宗教摆脱了尘世的束缚，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许多妇女在尼姑庵中不仅学习佛经，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因此有一些妇女出家后在文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有一些妇女为了成为学者主动放弃尘世生活而选择皈依。^{[25] (P1-20)}中国古代妇女虽生活在受封建礼教制约的世界中，但不论是通过才德获得声望，还是选择在远离尘世的生活中心追求自我，她们都凭借自我的能动性积极寻找摆脱社会束缚的路径，争取一个凸显女性自我存在的空间。

海外学者从士大夫视角、文学领域、对女性受教育和缠足的看法等方面分析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古代妇女，揭示了男性对女性持有焦虑和矛盾的态度。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男性仍将女性视为自我的镜像，通过塑造女性角色或模仿女性“声音”以抒发自我心境。海外学者通过对女性文人、女性空间、道德力量以及宗教的研究，打破了中国古代女性为“受害者”的观点，修正和重构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声音”。^{[26] (P61-55)}海外学者将中国古代女性置于特定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加以评论，突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是中国古代才子与女性共同创造的观点，对文学经典的界定发起了挑战。^{[27] (P20-34)}

四、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差异观是西方性别研究的基础。纵观历史，西方妇女运动兴起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男女性别角色调整；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启蒙运动开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妇女更是积极投身革命之中，革命结束后，不愿意重新回归家庭妇女的角色。^[28]因而，西方不断建立妇女组织，发起妇女解放运动。

作为西方文化两个主要的来源，不论是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思想，都受二元对立思维影响，贬低女性地位。而在中国，不论是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中国妇女自身认为存在能与男性匹敌的权威感而没有抗争，直到20世纪初，倡导男女平等的妇女群体才逐渐出现。虽然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男尊女卑的观点，但中国文化同样注重阴阳平衡、男女互补，提倡和谐。因此，在看待海外学术界的中国古代妇女研究时，一方面应该吸收海外学术界挑战文学经典、重构中国古代妇女“声音”时所提出的新观点，另一方面应该思考海外学术界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今后中国学术界的古代妇女研究是否应当追随西方的理论基础，沿袭西方妇女研究的范式？

从研究理论上来看，女性研究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从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考察社会中的性别问题；性别研究则偏向于探讨公共和私人空间中两性的关系，以及两性关系在历史变迁中的变化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起，虽然海外学术界由女性研究转向性别研究，但相关课题仍以女性为主，较少从男女性别关系互动的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妇女问题。从学科研究来看，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展现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为主要目标的史学界和以分析中国古代妇女文学为主的文学研究界，也有部分海外社会学者从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方面探讨中国古代妇女地位问题，但是海外学术界从哲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视角对中国古代妇女进行研究的内容并不多，学术界各学科之间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也不多。值得庆幸的是，海外男性学者积极投入研究中，有效地促进了海外学术界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

女性问题不是某个区域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问题，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需要共同面对和讨论的话题。女性研究作为一种高度综合的人文研究，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研究领域、采用单一的研究立场，应该打破不同学科研究课题之间的隔绝，加强不同国家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发掘更多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在全球的妇女研究中，中国古代妇女研究是一个相当丰富且极具意义的研究领域。研究海外学术界的中国古代妇女议题，有助于梳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两性关系的研究观点，发现研究的不足，引起中外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扩展中国古代妇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期待中国古代妇女研究能够逐渐形成一个多元的、与西方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相互参照的研究体系，既展现具有女性主体地位的国际化研究视野，又凸显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本土性特征；既能够充分地呈现中国古代妇女的客观形象，又能够侧面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最终为中国“主流”史学（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提供独具视角的材料与信息。

参考文献:

[1] (美) 伊沛霞. 性别与汉学: 14 到 19 世纪西方对缠足不断变迁的诠释 [A]. 姚平.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 Jinhua Emma Te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in the Western Academy: A Critical Review. *Signs*, vol. 22, no. 1, 1996.

[3] 姚平.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 Susan Mann. 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1993, (1).

[5] Paul S. Ropp.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view of recent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3, no. 3, 1994.

[6] (美)曼素恩.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 定宜庄, 颜宜蓓,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7] (美)白馥兰. 技术与性别: 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 江涓, 邓京力,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8] T' ien Ju-k' ang. 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h' ing Times. Leiden: E. J. Brill, 1988.

[9] (美)孙康宜. 情与忠: 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M]. 李爽学,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美)卢苇菁. 矢志不渝: 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M]. 秦立彦,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1] (美)高彦颐.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2] (美)孙康宜. 词与文类研究[M]. 李爽学,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 Howard Levy. 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 New York: Walton Rawls, 1996.

[14] (美)高彦颐. 缠足: “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M]. 苗延威,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5] Laurel Bossen, Hill Gates. Bound Feet, Young Hands.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6] (美)孙康宜. 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 (2).

[17] (美)方秀洁. 书写自我、书写人生: 沈善宝性别化自传/传记的书写实践[A]. 邱于芸, 王志锋, 译. 姚平.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8] Marina Hsiu-Wen Sung. The Narrative Art of Tsai-Sheng-Yuan: A Feminist Vision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 Socie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8.

[19] Paul S. Ropp. Love, Literacy, and Laments: Themes of Women Wri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2, no. 1, 1993.

[20] (日)远藤织枝. 亚洲汉字文化圈中的女性文字[A]. (日)远藤织枝, 黄雪贞. 女书的历史与现状: 解析女书的新视点[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1] (美)高彦颐. “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J].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1995, (3).

[22] 钱南秀. 清末女性空间开拓: 薛绍徽编译《外国列女传》的动机与目的[A]. 游鉴明. 中国妇女史论集: 十集[C]. 新北: 稻香出版社, 2013.

[23] (美)罗莎莉. 儒学与女性[M]. 丁佳伟, 曹秀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24] 宁一中, 段江丽. 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下)[J]. 文艺研究, 2008, (10).

[25] Kathryn A. Tsai. The Chinese Buddhist Monastic Order for Wome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Historical Reflections/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vol. 8, no. 3, 1981.

[26] (美) 孙康宜, 叶舒宪. 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S1).

[27] (美) 孙康宜. 孙康宜自选集: 古典文学的现代观[M]. 张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28] 张妙清, 叶汉明, 郭佩兰. 性别学与妇女研究: 华人社会的探索[C].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